

农村文化丛书

欧阳君山 金戈 编著

农村

发展农村集市，
繁荣农村经济。

集市庙会建设

改革传统庙会，
丰富庙会文化。



中国出版社

农村文化丛书

农村集市庙会建设

欧阳君山 金 戈 编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村集市庙会建设/欧阳君山,金戈编著. —北京:中国
出版社,2005.10

(农村文化丛书)

ISBN 7-5087-0855-5

I. 农... II. ①欧... ②金... III. ①农村—集市贸易—
概况—中国②农村—庙会—概况—中国 IV. F72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8327 号

书 名:农村集市庙会建设

编 著:欧阳君山 金 戈

责任编辑:王秀梅

出版发行:中国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66051698 电传:66051713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4

字 数:70 千字

版 次: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87-0855-5/F·144

定 价:7.50 元

(凡中国出版社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农村文化建设,担负着“面向农民群众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并对农民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向农民传播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为农村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事业建设服务、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农民文化素质”的重要任务,这个任务艰巨而光荣。

在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的发展经济的大道上,发展农村文化更显得重要。广大农民说:“我们在经济致富的同时,也需要文化致富。”

这就是当前农民最迫切的愿望。

为此,我们编写了“农村文化”丛书,这套丛书包括《农村村史家谱写作》、《农村集市庙会建设》、《农村新春联》、《农村新格言》、《农村新谚语》等共五册,以飨读者。

目 录

第一章 集市庙会简史	1
第一节 集市简史	1
1. 我国集市的最早记载	1
2. 我国集市的历史发展	2
3. 我国古代商业的系统记载	4
4. 新中国集市的极大发展	5
第二节 庙会简史	13
1. 我国庙会的形成	13
2. 庙会与佛教的融合	16
3. 庙会与道教的融合	20
4. 庙会的现代形式	23
第二章 集市庙会的作用	31
第一节 “交相利”	31
第二节 集市庙会的九大作用	33
1. 集市庙会的交易作用	34
2. 集市庙会的交流作用	35
3. 集市庙会的宣传作用	37
4. 集市庙会的教育作用	39
5. 集市庙会的消费作用	41

6. 集市庙会的娱情作用	42
7. 集市庙会的宗教作用	44
8. 集市庙会的带动作用	46
9. 集市庙会的其他作用	50
第三章 集市庙会的整顿和管理	53
第一节 农村集市庙会存在的问题	53
1. 无照经营严重	58
2. 假冒伪劣产品较多	58
3. 侵权案件难查	58
第二节 农村集市庙会治理对策分析	60
1. 规范农村集市	61
2. 加大监管力度	62
附录	65
第四章 农村集市庙会的改造和创新	75
第一节 与时俱进	75
第二节 庙会创新七大招	80
1. “复古”	81
2. “求洋”	82
3. 求专业	84
4. 走出去	86
5. 请进来	87
6. 送神请文化	89
7. 十全大乐	91
第三节 集市创新四大招	93
1. 时尚来包装	93

2. 名人来点饰	95
3. 科技来参与	97
4. “老鼠”去赶集	99
第五章 集市庙会的繁荣和发展	103
第一节 形势喜人	103
第二节 让人欢喜让人忧	107
第三节 鞭炮禁与放的启示	111
第四节 无为有治	113
1. 规范市场主体准入,经营行为监管到位	114
2. 规范商品质量准入,食品安全监管到位	115
3. 规范管理制度建设,市场秩序监管到位	116
4. 规范场内设施布局,划行归市监管到位	117
5. 规范行政执法行为,行风自我监管到位	117

第一章 集市庙会简史

第一节 集市简史

1. 我国集市的最早记载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 5000 年绵延不断的文明,集市在我国也由来已久。

我国古代典籍关于集市的最早记载恐怕是在《易经》,《易经·系辞》上面有这样一句话:“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显而易见,这里面所讲的已经是集市,一方面致民,使大家走到一起;一方面聚物,不是无所事事地走到一起,大家都带着商品;还有一方面就是交易,大家带着商品到一起,并且做了商品的交换,大家各得其所,这当然已经是集市,而且是比较成熟的集市。

但似乎还有出现得更早的集市雏形,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浙江先民最初聚居于 7000 年前的河姆渡,随之是 5000 年前的良渚。虽然无法确切知道当时是否存在着交易和市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分工已经存在,至少有种植业、畜牧业、捕捞业和手工业。这可能是最早的集市,因

为有分工就会有交换和交易,就有可能形成某种程度的集市。

2. 我国集市的历史发展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和智慧的民族,这一点也充分表现在古代集市的发展和繁荣上。

集市繁荣不繁荣,从形式上讲,第一要看什么呢?看广告!道理非常简单,广告也就是叫喊吆喝,它最直接地反映集市的发育和繁荣程度,看广告可以最充分地看出我国集市在历史上一路发展的情形。

最先的广告当然是实物陈列,但我国集市上很早就出现了叫喊吆喝声。殷墟甲骨卜辞即我国历史上已知最早的具有记录、宣示、传播性质的文字广告。殷墟甲骨卜辞以龟甲、兽骨为媒介,多以“告”字起首,有上报、告祭之意,是殷王室祈告天地、交通鬼神、祝佑先祖、占卜吉凶、记录史实的文字。

到战国时期,在齐国就出现了陶文署名广告。齐都临淄出土的以作器人名、场名、场址或产地铭文的陶文署名广告,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这是我国古代针对平民阶层、有明确目的的商业署名广告范例,其性质与我们今天最常见的“XX制造”基本相同,以求广为人知、销售畅通。

现在有所谓“炒作”一说,这其实并不新鲜,我国很早就有了广告动作。这方面最经典的案例或许要算秦国时期大商人吕不韦的“一字千金”。秦相吕不韦使门客著《吕氏春秋》,书成,悬榜示众,公布于咸阳城,声言有能增删一

字者，赏予千金，造成轰动效应，迅速提高了《吕氏春秋》知名度。同样，商鞅“城门立木”的政治宣传活动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品牌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但我国也很早就有了品牌。这方面的出色案例恐怕要算唐代的“雷公琴”。唐代斫琴名手，首推四川蜀中雷氏，尤以雷威所造之琴最负盛名，时人称为“雷公琴”。公元766—779年间，“雷公琴”即风传天下，闻名于世，成为有唐一代最著名的古琴品牌，有“唐琴第一推雷公，蜀中九雷独称雄”之誉。

由于印刷术的发明，我国古代甚至出现了世界最早的印刷广告实物，这就是北宋时期的“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广告铜版，铜版排布严整，图文并茂，既有名称，又有“玉兔捣春”的品牌标志，对产品原料、制造质量、使用效果、优惠条件、售卖方法着意宣传，突出“店铺讲求诚信和质量”的经营之道，具备设计完整的商标体系，体现出强烈的宣传意识。

宋代甚至还出现了图画广告，把商业性和艺术性结合在一起。宋代杂剧《眼药酸》的广告画，商业服务与文化消费互为表里，主题突出，形象生动，表现夸张，形成了广告的整合优势，增强了广告效应，体现出南宋时期我国比较成熟的广告水准。

要感知一下我国古代广告的发展和集市的繁荣，莫过于欣赏《清明上河图》，在这幅名画的整个画卷中，广告招牌23处、广告旗帜10面、灯箱广告4块、大型广告装饰彩

楼、欢门5座,足以证明宋代纷繁多样的广告形式。尤为难得的是,图中保留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灯箱广告记载。真有点“不知昔夕今夕兮”!

3. 我国古代商业的系统记载

《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这是史太公司马迁声明在《史记》中专门为商人和商业作《货殖列传》的原因和动机。其实,史太公作《货殖列传》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商业的充分发展,也是对我国古代商业发展的第一次系统记载。

“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而言,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历史学家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

全文主要是为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作传。通过介绍他们的言论、事迹、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商品、有名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各地的生产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叙述他们的致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经济思想,以便“后世得以观择”。

史太公认为,商业发展和集市繁荣是自然趋势,人们

没有不追求富足的。“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匱少。”所以，他主张应根据实际情况，任商人自由发展，引导他们积极进行生产与交换，国家不必强行干涉，更不要同他们争利。

书中写有这样一段话：太行山以西盛产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东多有鱼、盐、漆、丝、美女；江南出产楠木、梓树、生姜、桂花、金、锡、铅、朱砂、犀牛、玳瑁、珠子、象牙兽皮；龙门、碣石山以北地区盛产马、牛、羊、毡裘、兽筋兽角；铜和铁则分布在周围千里远近，山中到处都是，有如棋子满布。这是关于各地物产分布的大致情况。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喜好的，习用的穿着、饮食、养生、送死之物。所以，人们要靠农民耕种，取得食物，要靠虞人进山开采、渔夫下水捕捉，获得物品，要靠工匠制造，取得器具，要靠商人贸易，流通货物。这难道还需要官府发布政令，征发百姓，限期会集吗？这最后一句直接就支持集市的发展和繁荣，原话是：“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

4. 新中国集市的极大发展

鸦片战争爆发后，在坚船利炮以至于鸦片的支持下，西方人把中国人打败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时陷入混乱，儒家文化落荒而逃——王国维在昆明湖自尽！西方文化大军压境，形形色色的思想主义——从“德先生”到“赛先生”以至于“超人”——向中国人发起了攻心战，的确是在中国人心里面“激起了骚动和不安”！

1949年8月5日——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不久，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国务卿艾奇逊自以为是地总结了“西方的影响”：

中国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3000多年的发展，大体上不曾沾染外来的影响。中国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后总是能够驯服和融化侵入者。他们自然会因此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类的最高表现。到了19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中国孤立的墙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这些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于这些品质，一部分由于清朝统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融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

——这一骚动和不安其实再现在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也就包括商业和集市的发展。即使是天下澄清，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思想上的混乱仍然存在，走过一段“资本主义尾巴”、“打击投机倒把，巩固集体经济”、赶“社会主义大集”的大路。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集市又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浙江杭州建城较早，至唐时已成为大商埠，宋代更是繁荣一时，明清两代亦是商贾云集，甚至曾出现“杭民半多商贾”的盛况。但近现代由于国运坎坷，杭州亦走过一段艰难曲折的历史。下面以杭州为例，简要地回顾一下集市

在我国的发展过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过程。
《杭州志·商业篇》有概述:

杭州自隋炀帝开凿了江南运河,藉水陆之利,已是“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臻”的繁荣城市。到唐代,杭州“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成为中国东南部的一大商埠。五代时,吴越国定都杭州,钱塘江边“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当时航运发达,商贸昌盛,与日本、高丽、新罗、大食等国进行通商。北宋时,杭州成了中国四大商港之一。南宋定都杭州后,御街两侧店铺林立,酒肆茶楼、艺场教坊、驿站旅舍,比比皆是。城内城外有药市、花市、珠子市、米市、肉市、鱼市、布行、猪行、鲞团等集市。官营与民营丝绸作坊、店铺遍布街巷,丝绸贸易十分兴旺,同时还大量运销国外。至元代,杭州仍为东南重镇,工商业持续繁荣,海外贸易又有发展。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说“城内各街道上有不计其数的店铺外,还有十个大广场或市场”,称杭州是“最美丽华贵”的“天城”。元末,杭城连遭大火和战乱,商业萧条。明初,朝廷采取奖励垦荒,兴修水利等措施。至明中后期,杭州商业逐渐复苏,每年春季香客云集,游春购物。香市期间设有许多市场,往来交易,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清康熙年间开放海禁,杭州从商人数增多,史称“杭民半多商贾”。绸业有新的发展,所产绸缎营销全国各地;并出口日本、朝鲜、泰国、菲律宾等国家及阿拉伯和波斯湾地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杭州自给自足的经济占主要地位,商品生产不发达,商业发展缓慢。到20世纪,随着沪杭甬和浙赣铁路先后建成通车,杭

州成为浙西、皖南、赣东、闽北等地大宗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又是东南沿海工业品重要交易市场,推动了杭州商品市场的发展。民国 18 年(1929 年)杭州举办大型西湖博览会,对提高杭州商品的知名度、拓展杭州商品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到民国 20 年(1931 年),杭州商店总数达 10,363 家,分 96 个行业,其中以饮食、旅馆业最为发达,有菜饭面食店 621 家、旅馆 168 家。

民国 26 年(1937 年)12 月日军侵占杭州,许多商家关闭歇业,不少大中商号内迁,经济萧条,每况愈下。杭州沦陷期间,人口由抗日战争前(民国 26 年底)的 59.6 万减至 30 余万;商号从 14,611 家锐减到 5681 家。抗日战争胜利后,经济虽有复苏,但物价暴涨,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粮价与抗日胜利初期相比,民国 37 年 8 月 20 日(即法币改金圆券后,法币流通兑换最后一天)涨到 1.7 万倍。

自明清起,特别是辛亥革命后,杭州商品生产有所扩大,出现了资本主义商业的萌芽。但由于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加上自然灾害和兵祸,民族商业备受摧残,处于每况愈下的境地。

1949 年 5 月杭州解放。6 月,成立杭州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和杭州市贸易公司。此后,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先后按专业分工建立了各级经营机构;按经济区域设置批发站。从批发到零售商业、集市贸易、专业市场等,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商业体系,对恢复国民经济,平抑市场物价,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积累建设资金做出了重大贡献。

杭州解放初期,社会尚未安定,国营经济力量还很薄弱,投机不法分子乘机抢购粮食、棉纱、棉布等重要物资,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出现了1949年5月至11月中旬接连3次粮食等商品的物价大暴涨。杭州市人民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在加强市场管理的同时,积极发展国营和合作社商业,紧急调集并大量抛售粮食、煤炭、棉纱、棉布、食盐等主要商品,依法打击投机奸商,从而结束了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持续十几年的市场物价剧烈动荡的局面。

1950年春,市场物价平稳后,因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虚假购买力明显减少,市场出现暂时呆滞。1951—1952年,省、市和杭州市今辖各县普遍举办了城乡物资交流会和商业交易会,促进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和市场繁荣。

1952年上半年的“五反”运动后,公私商业经营比重发生很大变化,国营和合作社商业经营比重大幅度上升。杭州市区国营粮食商业(包括合作社)经营比重,1950年为36.9%,1952年则上升到90.3%。为充分发挥私营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避免私营商业歇业和店员过多失业,1952年下半年开始,采取国营商业让出一部分销售市场和商品、扩大批零差价等办法,扶助私营商业。市区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停止或部分停止供应的商品291种;调整(提高)批零差价的商品157类、2844种,降低批发起点商品37种;撤销部分零售店及作坊,让给私营商业经营。这些政策的调整,有利于私营商业的经营和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以前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

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1950年初,市区有12家私营粮店接受委托代销大米;1950年和1951年,对关系人民生活的主要商品大米、面粉、棉纱、棉布、棉织品、火柴、肥皂等,先后由国营商业委托加工、订购包销。从1953年开始,私营零售商供应的商品,多数由国营批发部门计划分配,批发商业转为计划市场。至1955年,市区23个行业中的249户批发商,其业务全部由国营和合作社商业替代。1956年1月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市区有131个行业、2533家私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小商小贩也组成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走上了合作化道路。1957年,市区零售商业(包括饮食服务业)网点共有12,731个,从业人员26,479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1,961万元,比1950年的10,614万元翻了一番多。在这期间,物价稳定,市场繁荣。

1958年后,由于“大跃进”和自然灾害,农业减产,市场供求矛盾严重,商品供应紧张。商业部门也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大购大销”,使国家财产遭受大量浪费和损失,加剧了商品供应的紧张状况。到1962年底,市区商业部门因商品报废,损失总值达185万元,积压待处理商品有467种,价值220万元。在商品流通及所有制上,急于取消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把供销合作社由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把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升为国营,压缩和裁并了许多网点,农村集市贸易一度停止,基本形成由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局面。

1961年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商